

政府数据透明与企业可持续治理：公共数据开放对企业 ESG 表现的治理效应及其边界条件

王仁和¹ 季冉冉¹ 刘泳彤¹

(1. 华南师范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摘要：政府数据透明是否能够推动企业可持续治理，是数字政府建设与企业 ESG 研究交叉领域的重要议题。本文以公共数据开放为切入点，考察政府侧数字治理改革对企业 ESG 表现的治理效应及其边界条件。基于我国地级市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分批建设的背景，本文构建城市—企业—年份层面的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识别公共数据开放对企业 ESG 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共数据开放显著提升了企业 ESG 表现，说明政府数据透明能够通过改善外部信息环境、强化市场与社会监督，推动企业可持续治理。进一步分析表明，公共数据开放的治理效应具有明显的边界条件，当企业面临更强的信息监督与声誉约束、获得更高的政策激励，并具备更好的内部治理能力时，公共数据开放对企业 ESG 表现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本文将公共数据开放纳入企业 ESG 表现的解释框架，揭示了数字政府建设对企业可持续治理的外溢影响，拓展了公共数据开放的治理效应研究，也为推动政府数据透明与企业 ESG 治理协同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关键词：公共数据开放；政府数据透明；企业 ESG 表现；可持续治理；边界条件

Government Data Transparency and Corporate Sustainable Governance: The Governance Effect of Public Data Openness on Corporate ESG Performance and Its Boundary Conditions

Wang Renhe¹ Ji Ranran¹ Liu Yongtong¹

(1.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06)

Abstract: Whether government data transparency can enhance corporate sustainable governance remains a critical issue at the intersection of digital government development and corporate ESG research. Focusing on local public data openness,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governance effects of government-le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corporate ESG performance, as well as the boundary

【项目来源】2025年度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广东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数智化运行机制与绩效评估研究”（GD25YG G34）；2026年广东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创新训练项目“粤港澳大湾区企业与社会组织 ESG 协同治理机制及效能研究——基于组织协同的视角”（S202610574009）；2025年度中国商业经济学会社会治理与 ESG 专业委员会社会治理与 ESG 科学研究规划一般课题“跨境政策溢出与企业 ESG 实践：香港 ESG 新政的传导机制与内地企业自主合规策略研究”（CEAESG2025040）。

conditions that shape these effects. Based on the staggered construction of public data open platforms across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China,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city–firm–year panel dataset and employs a staggere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approach to identify the impact of public data openness on corporate ESG performance. The findings show that local public data openness significantly improves corporate ESG performance, suggesting that government data transparency can promote corporate sustainable governance by improving the external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and strengthening market and social oversight. Further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governance effect of public data openness is conditional: its positive effect on corporate ESG performance is more pronounced when firms face stronger information supervision and reputational constraints, receive greater policy incentives, and possess stronger internal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This study incorporates local public data openness into the explanatory framework of corporate ESG performance, reveals the spillover effect of digital government construction on corporate sustainable governance, extends research on the governance effects of public data openness, and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for promot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government data transparency and corporate ESG governance.

Keywords: Public Data Openness; Government Data Transparency; Corporate ESG Performance; Sustainable Governance; Boundary Conditions

一、引言

企业可持续治理日益成为国家治理、资本市场监管和社会责任评价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ESG 表现已不再只是企业内部治理或信息披露问题，而逐渐成为衡量企业回应公共价值、承担社会责任和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的重要指标。既有研究主要从公司治理、环境规制、投资者关注、媒体监督和资本市场约束等角度解释企业 ESG 表现差异^[1]，为理解企业可持续治理提供了重要基础。然而，地方政府数字治理改革对企业可持续治理的外溢影响仍有待进一步探讨。近年来，已有研究开始关注地方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对企业 ESG 表现的影响^[2]，但相关研究多侧重于识别其影响效果，对于公共数据开放在何种条件下更容易转化为企业 ESG 改善，仍缺乏充分讨论。基于此，本文进一步提出如下问题：地方政府通过公共数据开放提升政府数据透明度，能否促进企业 ESG 表现改善？这一作用又会在何种条件下更加显著？

公共数据开放通常被视为数字政府与开放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政府数据透明的一种制度化、数字化和可再利用形态，能够提升政府透明度、促进数据利用并优化公共服务供给^[3]。然而，在数字化治理情境下，政府数据并非仅仅是封闭于行政系统内部的技术资源，而是重塑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信息关系的制度性基础设施^[4]。当地方政府以结构化、可获取和可利用的方式开放公共数据时，其影响并不

局限于提升政府自身透明度，还可能改善企业所处的外部信息环境，使企业行为更容易被市场主体、媒体、分析师和社会公众识别、比较与评价^[5]。这种信息环境的改变，使公共数据开放可能产生超越政府治理本身的外溢效应，进而影响企业可持续治理表现。

ESG 评价高度依赖多源信息。公共数据开放带来的信息可得性提升，能够为识别企业环境责任、社会责任履行和治理行为提供更加充分的公共信息基础，从而促使企业改善可持续治理表现^[6]。然而，公共数据开放的治理效应并非必然产生，其不仅涉及“是否有效”，也涉及“在何种条件下更有效”^[7]。数据开放释放的是信息资源和透明压力^[8]，但这些信息能否被有效识别、传播并转化为企业治理改进取决于多重边界条件，即信息监督、声誉约束、政策激励与内部治理能力。第一，信息监督和声誉约束可提升企业行为市场可见度和公众关注度^[9]，助推企业进行实质性 ESG 实践。第二，政策激励能够为企业可持续转型提供外部资源支持。第三，企业内部治理能力决定其外部透明压力转化为实践的效率^[10]。基于此，本文以我国地级市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分批建设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识别公共数据开放对企业 ESG 表现的影响，并进一步从信息监督、正向声誉、政策激励与内部治理四个维度检验其边界条件。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将公共数据开放纳入企业 ESG 表现的解释框架，揭示政府侧数字治理改革对企业可持续治理的外溢影响；第二，从企业行为结果出发拓展公共数据开放的治理价值，说明其不仅影响政府透明度和公共服务，也可能通过改善外部信息环境影响市场主体行为；第三，识别公共数据开放发挥作用的边界条件，将研究重点从“是否有效”推进到“何以有效、何时更有效”，从而深化对政府数据透明影响企业可持续治理的机制理解。

二、文献综述及研究假设

（一）政府数据透明与企业可持续治理：地方公共数据开放的治理效应

近年来，已有研究开始关注地方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对企业 ESG 表现的影响^[2]，但相关研究多侧重于识别公共数据开放的平均治理效应，对于其在何种条件下更容易转化为企业 ESG 改善，仍缺乏充分讨论。既有研究普遍认为，组织透明度的提升有助于改善治理绩效并抑制机会主义行为^[11]。地方政府公共数据开放是提升政府透明度的重要实践形式，其核心在于政府以开放格式向公众提供其在履职过程中收集和产生的数据^[7]，使这些数据能够被自由获取、再利用与广泛传播^[3]。不同于企业自愿披露且可能存在选择性披露或“漂绿”倾向的 ESG 报告，政府公共数据来源于公共机构履职过程中的行政记录，具有“主体要素”与“行为要素”的双重公共属性^[12]，因而具备企业自主披露所不具有的制度公信力和外部约束特征。

从开放政府视角看，公共数据开放强调公共部门数据的可获取性、可再利用性和社会共享性，为外部主体识别、验证和评价企业行为提供了低成本的信息基础^[2]。这意味着利益相关者不再完全依赖额外付费、私下渠道或企业自我披露来判断企业 ESG 行为的真实性，从而显著降低了信息搜寻与验证成本。

在此基础上，公共数据开放进一步重构了政府、市场与企业之间的信息结构。信息不对称是导致政商关系扭曲和企业机会主义行为的重要诱因，而政府主动开放原本封闭于行政系统内部的数据，有助于降低外部主体获取涉企信息的成本，提升权力运行透明度，进而打破政企之间的信息壁垒^[13]。这种制度安排使市场和社会主体获得了独立验证企业行为的能力，改变了以往政府掌握公共信息、企业掌握经营信息而外部主体难以有效核验的非对称格局。

因此，公共数据开放能够通过降低信息验证成本与重构信息结构，强化外部监督和问责机制，为企业开展实质性 ESG 实践提供制度约束^[14]。具体而言，其作用机制主要体现为两条路径。其一是透明度路径。当监管机构、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能够依托开放数据平台审视企业的治理结构、环境行为和经营活动时，企业通过虚假 ESG 报告获取短期利益的空间将被压缩^[14]。持续性的外部审视有助于形成有效问责机制^[15]，促使企业依靠真实的 ESG 表现获得市场认可和声誉收益。其二是参与路径。公民参与强调多元利益相关者通过对话、协商和信息交流，共同推动公共目标的实现^[17]。公共数据开放提高了环境监管、行政处罚、信用记录、财政补贴和公共资源交易等涉企信息的可得性，使外部主体能够从多个维度影响企业行为^[16]，进而推动企业 ESG 表现提升。

综上，公共数据开放通过系统公开政府掌握的多领域数据，能够构建由政府、市场和社会主体共同参与的外部监督网络。这种制度安排降低了企业利用信息不对称掩盖真实环境与社会影响的可能性^[4]，进而激励企业投身于 ESG 实践。故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公共数据开放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的 ESG 表现。

（二）信息监督与声誉约束：公共数据开放效应的信息传导条件

前文指出，公共数据开放提供的是政府侧信息供给，但信息供给并不必然自动转化为促进企业 ESG 表现的治理效应或实质性约束；这种转化具有条件性，取决于开放数据能否被有效识别、传播并转化为企业可感知的行为压力^[18]。

在资本市场层面，分析师作为专业信息中介，能够进行信息监督，对开放数据进行筛选、加工和解释^[7]，通过研究报告、盈利预测、评级预期和市场信号影响投资者判断，对企业间接施加影响。公共数据开放平台所提供的经济运行、环境监测、企业注册、监管处罚等多维度数据，有助于分析师更准确地识别企业 ESG 表现^[5]，进而缓解企业与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19]。这意味着，当分析师关注度较高时，企业受到的信息监督越强，ESG 行为更容易被资本市场识别、比较和评价，管理层采取象征性 ESG 披露或“漂绿”行为的空间也相应收窄^[20]，公共数据开放对企业 ESG 表现的促进作用越强。

公共数据开放降低了媒体、社会公众和第三方机构获取企业相关公共信息的成本，使企业行为更容易被外部主体发现、传播和评价^[2]。当企业具有较高媒体可见度时，其 ESG 行为更容易进入公众视野，企业不当行为一旦暴露，便可能经由新闻媒体、社交平台和社会舆论迅速扩散^[5]，进而引发声誉损失、市场制裁和信任危机^[21]。在此过程中，正向声誉机制会进一步放大公共数据开放的治理效应。高声誉企业通常拥有更多正面新闻报道，其社会形象和市场认可已经形成，因而也面临利益相关者更高的期待和

更严格的监督。一旦这类企业的 ESG 表现与其既有正面形象不相匹配，其所承受的声誉损失风险可能高于低声誉企业^[22]。为避免“声誉光环”转化为“声誉负担”，高声誉企业更有动力回应公共数据开放所释放的信息压力，切实改善自身 ESG 实践。因此，正向声誉约束能够放大公共数据开放的治理效应，推动企业从象征性合规转向实质性 ESG 实践。

由此可见，分析师关注与正向声誉约束分别从资本市场信息监督和社会声誉约束两条路径强化了公共数据开放的治理效应，二者共同构成公共数据开放发挥作用的重要信息传导条件。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企业受到的信息监督越强，公共数据开放对其 ESG 表现的作用越强。

H3：企业面临的正向声誉约束越强，公共数据开放对其 ESG 表现的促进作用越显著。

（三）政策激励：公共数据开放效应的政策资源条件

除信息传导条件外，公共数据开放的治理效应还依赖于政策激励所提供的资源条件。单纯的透明度提升并不必然转化为企业行动，其对组织行为的影响关键在于，开放数据所释放的信息能否转化为企业可感知的行为约束与收益激励^[2]。换言之，开放数据本身主要是一种信息供给，其治理效应并非自动产生，而是需要配套制度环境与政策工具的支持。只有当开放数据所承载的信息能够进入企业经营决策，并转化为可量化、可感知的成本与收益时，才可能对企业 ESG 实践产生实质性影响^[13]。若缺乏相应的激励配套，数据开放所带来的透明度提升可能更多表现为合规压力，难以激发企业进行长期 ESG 投入的内生动力^[6]。

在上述逻辑下，外部政策激励成为连接公共数据开放与企业 ESG 行动的重要条件。ESG 实践，尤其是环境治理、节能减排和绿色技术创新，通常具有前期投入规模大、投资回报周期长等特点，高额成本是制约企业采取实质性 ESG 行动的重要障碍^[9]。在公共数据开放所带来的透明压力下，企业能否将外部监督转化为实质性 ESG 改进行动^[23]，还取决于其是否具备相应的资源条件。绿色补贴作为一种政策激励，能够缓解企业开展环境治理和绿色转型所面临的资金约束，使企业在回应外部信息监督时拥有更充分的资源支持。因此，当企业获得更高强度的绿色补贴时，公共数据开放对企业 ESG 表现的促进作用可能更强。

与此同时，绿色补贴不仅提供资源支持，也会强化公共数据开放所带来的信息透明压力，形成持续性的政策约束。对于获得较高绿色补贴的企业而言，补贴意味着其在一定程度上被政府识别为绿色转型或环境治理支持对象^[24]，如果企业在获得补贴后 ESG 表现不佳，可能影响其后续补贴获取机会^[25]和政策支持资格^[26]。因此，高补贴企业为了维持政策支持资格和外部合法性，更有动力持续改善 ESG 表现^[13]。

综上，公共数据开放的治理效应并非孤立发生，而是受到政策激励条件的影响。绿色补贴通过缓解资源约束和强化政策约束，增强了企业回应公共数据开放所释放透明压力的能力与动机。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4：企业受到的政策激励越强，公共数据开放对其 ESG 表现的作用越强。

（四）内部治理能力：公共数据开放效应的组织转化条件

与信息传导条件和政策资源条件相呼应，公共数据开放的治理效应还需依赖内部治理能力这一组织转化条件。企业对外部制度环境与市场信号的响应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内部治理能力。公共数据开放通过系统性开放政府履职过程中积累的多维度数据，重构了企业所处的信息环境，并对企业形成更为明确的外部监督压力^[2]。然而，外部制度冲击能否转化为企业实质性行为变革，并非由外部环境单方面决定，而是高度依赖于企业自身的内部治理禀赋^[12]。在相似的外部信息环境下，不同企业在 ESG 实践上的表现仍可能存在显著差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企业内部治理能力的异质性^[27]。

内部治理能力较弱的企业往往存在战略短视、代理冲突、资源配置低效、制度执行形式化和内控体系失效等问题^{[2][9]}，缺乏 ESG 资源投入动力，即便面临 ESG 合规压力，也可能无法承接合规要求，难以做出有效响应，更难以实现 ESG 表现的实质性提升^[3]。

相反，内部治理能力较强的企业则能够通过以下两条路径，更有效地将公共数据开放所释放的透明压力转化为实际的 ESG 改进行动。其一，战略决策与资源配置路径。完善的企业内部治理可缓解委托代理问题、抑制管理层短视，推动企业将 ESG 纳入长期战略^[27]。这样一来，企业便能高效识别开放数据传递的信号，统筹调配核心资源，将外部信息压力转化为 ESG 战略落地^[23]。其二，制度执行与风险管控路径。内部控制是企业内部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可通过全流程设计确保 ESG 决策穿透至经营环节^[9]。由此，治理能力较强的企业能依托完善内控，结合开放数据优化 ESG 管理、建立风险防控机制^[13]。

综上，内部治理能力决定了企业能否有效吸收公共数据开放带来的外部信息压力，并将其转化为实际 ESG 表现。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5：企业内部治理能力越强，公共数据开放对企业 ESG 表现的作用越强。

三、研究设计

本文以中国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并进一步匹配企业财务数据、公司治理数据、ESG 报告披露数据以及城市层面的公共数据开放信息。在剔除 ST、*ST 公司以及关键变量缺失的观测值后，受限于彭博 ESG 数据对 A 股上市公司的覆盖范围，本文最终获得 2012—2022 年共 11 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样本包括 1361 家上市公司和 8512 个企业—年份观测值。

（一）变量选取

在因变量方面，本文以企业 ESG 表现作为被解释变量，主要采用彭博 ESG 评分（Bloomberg ESG）进行衡量。该指标综合反映企业在环境、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等方面的信息披露与治理表现，具有较强的国际可比性和资本市场认可度^[28]。为检验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文进一步采用华证 ESG 评分（Huazheng ESG）作为替代性因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华证 ESG 评分更贴近中国资本市场制度环境和本土企业 ESG 实践，能够为本文结论提供补充性验证。

在核心解释变量方面，本文采用公共数据开放（PublicDataOpen）衡量地方政府公共数据开放水平。公共数据开放反映地方政府通过开放公共数据资源、提升政务信息透明度和增强数据可获得性来改善外部信息环境的程度。在数据搜集方面，本文以地级市为基本识别单元，通过地方政府官网、政务服务平台、公共数据开放平台、数据资源管理局或大数据管理局网站等公开渠道，手工整理各地级市公共数据开放情况。若某地级市在特定年份已建成并公开运行公共数据开放平台，或在省级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中设有明确的地级市数据开放专区，则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对于平台上线时间不明确的城市，本文进一步结合政府公告、政策文件、平台新闻动态、网页留痕信息以及数据集最早发布日期进行交叉核验。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指公共数据开放不同于一般政务公开，只有当地方政府提供结构化公共数据目录、数据集下载、接口服务或数据申请渠道时，才被认定为已开展公共数据开放。

调节变量方面，本文从信息监督、正向声誉、政策激励与内部治理四个维度构造调节变量。第一，信息监督以分析师关注度（AnalystAttention）衡量，采用企业年度分析师跟踪数量或研究报告数量表示^[29]，数据来源于 CSMAR 中国上市公司分析师预测研究数据库。第二，正向声誉以报刊财经正面新闻数（PositiveNews）衡量，采用企业年度正面财经新闻报道数量表示，数据来源于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的中国上市公司财经新闻数据库（CFND）。第三，政策激励以绿色补贴占营业收入比重（GreenSubsidy）衡量^[30]，基于 CSMAR 政府补助明细数据，从上市公司年度报告披露的政府补助项目中识别绿色、环保、节能、减排、清洁生产等相关补贴，并以其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进行标准化处理。第四，内部治理能力以内部控制质量（InternalControl）衡量^[31]，采用迪博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表示，数据来源于迪博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数据库。

在控制变量设置上，本文主要从企业财务特征、公司治理特征和地区经济环境三个方面控制影响企业 ESG 表现的潜在因素。其中，企业财务特征包括上市年限（ListAge）、总资产增长率（AssetGrowth）、公司规模（Size）、总资产净利润率（ROA）、资产负债率（Lev）、市净率（PB）、固定资产占比（Fixed）和员工人数（Employee），用于控制企业成长阶段、经营绩效、资本结构与资源配置状况。公司治理特征包括独立董事比例（Indep）、董事会规模（Board）、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和两职合一（Dual），用于控制企业治理结构与权力配置差异。地区经济环境变量包括地区生产总值的自然对数（LnGDP）、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SecondaryIndustry）、人口规模（Population）和财政收支压力（FinancialPressure），用于控制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市场规模与财政约束条件。企业层面数据来源于国泰安 CSMAR 数据库，城市层面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为避免极端值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本文对总资产增长率（AssetGrowth）、资产负债率（Lev）、市净率（PB）、报刊财经正面新闻数（PositiveNews）以及绿色补贴占营业收入比重（GreenSubsidy）等存在明显极端值的变量，在年份层面进行上下 1%缩尾处理，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1。

表 1 描述性统计

Variable	N	Mean	Std. Dev.	Min	Max
Bloomberg ESG	8511	32.823	9.746	10.744	71.180
Huazheng ESG	8512	75.345	5.425	47.600	92.930
PublicDataOpen	8141	0.518	0.500	0	1
ListAge	8512	2.492	0.722	0	3.466
AssetGrowth	8402	0.148	0.252	-0.294	3.366
Size	8512	23.657	1.656	18.429	31.191
ROA	8402	0.048	0.069	-0.645	0.969
Lev	8512	0.500	0.206	0.050	0.943
PB	8424	2.987	2.970	0.248	27.496
Fixed	8512	0.220	0.182	0	0.954
Employee	8512	8.673	1.348	2.890	13.253
Indep	8512	37.647	5.843	10	80
Board	8512	2.196	0.219	1.386	3.045
TOP1	8512	36.902	16.436	3.390	89.986
Dual	8512	0.198	0.399	0	1
LnGDP	8140	18.298	1.104	14.243	19.917
SecondaryIndustry	8140	38.411	11.605	13.550	81.820
Population	8140	827.292	533.692	19.80	3416
FinancialPressure	8140	156.292	76.973	64.882	894.586
AnalystAttention	6556	14.203	12.759	1	75
PositiveNews	7885	43.338	89.175	0	953
GreenSubsidy	8512	0.025	0.095	0	1.155
InternalControl	8200	668.982	87.022	30.620	985.600

（二）模型构建

为实证检验公共数据开放是否能够促进企业 ESG 表现改善，并进一步考察该影响在不同信息环境、外部监督强度、政策支持水平和内部治理条件下是否存在差异，本文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ESG_{it} = \beta_0 + \beta_1 PublicDataOpen_{it} + \gamma X_{it} + \sigma_i + \mu_t + \varepsilon_{it} \quad (1)$$

$$ESG_{it} = \beta_0 + \beta_1 PublicDataOpen_{it} + \beta_2 Moderating Variable_{it} + \beta_3 PublicDataOpen_{it} \times Moderating Variable_{it} + \gamma X_{it} + \sigma_i + \mu_t + \varepsilon_{it} \quad (2)$$

其中， ESG_{it} 表示各年度企业 ESG 表现，主要采用 Bloomberg ESG 评分衡量，并以 Huazheng ESG 评分进行替换变量稳健性检验； $PublicDataOpen_{it}$ 表示企业 i 所在城市在年份 t 是否开展公共数据开

放； $Moderating Variable_{it}$ 为调节变量； X_{it}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 σ_i 和 μ_t 分别表示企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β 为本文关注的核心变量系数。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 2 报告了公共数据开放对企业 ESG 表现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本文以 Bloomberg ESG 评分作为因变量，核心解释变量为地级市公共数据开放（PublicDataOpen）。列（1）仅控制企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列（2）进一步加入企业财务特征与公司治理特征控制变量，列（3）在此基础上继续加入地区层面的经济社会环境控制变量。

从回归结果看，公共数据开放变量在各组模型中的估计系数均为正，且均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具体而言，在未加入控制变量的列（1）中，公共数据开放的系数为 0.733，并在 5%水平上显著；加入企业层面控制变量后，列（2）中公共数据开放的系数为 0.615，仍在 5%水平上显著；进一步控制城市层面因素后，列（3）中公共数据开放的估计系数为 0.580，并在 10%水平上显著，说明在控制城市层面特征后，公共数据开放对企业 ESG 表现的正向促进作用依然成立。列（4）和列（5）进一步分别采用城市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以及企业—城市双向聚类稳健标准误进行检验，公共数据开放的系数依然显著为正，表明本文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相较于尚未开展公共数据开放的城市，已开展公共数据开放的城市中，企业 ESG 表现平均更好。该结果支持本文的假设：公共数据开放可能通过提升地方政府信息透明度、改善外部信息环境、强化社会和市场监督，从而推动企业更加重视环境责任、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表现。

表 2 公共数据开放对企业 ESG 表现的基准回归结果

	(1)	(2)	(3)	(4)	(5)
	Bloomberg ESG				
PublicDataOpen	0.733** (0.300)	0.615** (0.299)	0.580* (0.300)	0.580* (0.307)	0.580** (0.283)
ListAge		0.207 (0.630)	0.245 (0.627)	0.245 (0.788)	0.245 (0.728)
AssetGrowth		-0.124 (0.264)	-0.116 (0.273)	-0.116 (0.350)	-0.116 (0.325)
Size		2.136*** (0.450)	2.159*** (0.446)	2.159*** (0.546)	2.159*** (0.505)
ROA		1.015	0.940	0.940	0.940

		(1.571)	(1.572)	(1.958)	(1.806)
Lev		-5.716***	-5.892***	-5.892***	-5.892***
		(1.216)	(1.207)	(1.623)	(1.496)
PB		0.121**	0.132***	0.132***	0.132***
		(0.048)	(0.048)	(0.044)	(0.041)
Fixed		2.785*	2.799*	2.799*	2.799**
		(1.482)	(1.471)	(1.431)	(1.324)
Employee		0.097	0.073	0.073	0.073
		(0.367)	(0.362)	(0.441)	(0.407)
Indep		0.033	0.035	0.035	0.035*
		(0.023)	(0.023)	(0.022)	(0.021)
Board		0.580	0.605	0.605	0.605
		(0.856)	(0.845)	(0.783)	(0.722)
TOP1		-0.004	-0.005	-0.005	-0.005
		(0.017)	(0.017)	(0.017)	(0.016)
Dual		0.271	0.253	0.253	0.253
		(0.282)	(0.281)	(0.281)	(0.260)
LnGDP			-1.681**	-1.681**	-1.681**
			(0.786)	(0.781)	(0.732)
SecondaryIndustry			-0.079**	-0.079**	-0.079**
			(0.032)	(0.033)	(0.031)
Population			0.003	0.003*	0.003*
			(0.002)	(0.002)	(0.002)
FinancialPressure			-0.007**	-0.007*	-0.007*
			(0.003)	(0.004)	(0.004)
企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32.483***	-19.977**	11.784	11.784	11.784
	(0.155)	(9.348)	(15.716)	(17.544)	(16.449)
N	8028	7842	7842	7842	7842
R-squared	0.853	0.857	0.858	0.858	0.858

注：*、**、***分别表示估计结果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其中列（1）至（3）按企业层面聚类，列（4）按城市层面聚类，列（5）按企业和城市层面双向聚类。

（二）稳健性检验

图 1 报告了公共数据开放影响企业 ESG 表现的平行趋势检验与安慰剂检验结果。左图为基于事件研究法的平行趋势检验。结果显示，在公共数据开放实施之前，各期估计系数整体围绕 0 波动，且置信区间大多覆盖 0，说明处理组与对照组企业在政策实施前不存在显著的系统性差异趋势，基本满足多期双重差分法的平行趋势假设。公共数据开放实施后，估计系数逐渐转为正值，并呈现持续上升趋势，表明公共数据开放对企业 ESG 表现的促进作用并非短期冲击，而是随着数据平台运行、数据资源积累和外部监督环境改善逐步显现，具有一定的动态累积效应。

右图为安慰剂检验结果。本文随机设定处理组和政策实施时间，并重复估计核心模型 1000 次。结果显示，随机估计系数主要集中在 0 附近，而基准回归的真实估计系数明显位于随机分布右侧。这说明公共数据开放对企业 ESG 表现的促进作用并非由随机政策冲击、模型设定或样本偶然性导致。结合图 1 的平行趋势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公共数据开放实施前处理组与对照组具有较好的可比性，本文的因果识别结果具有较强的可信度和稳健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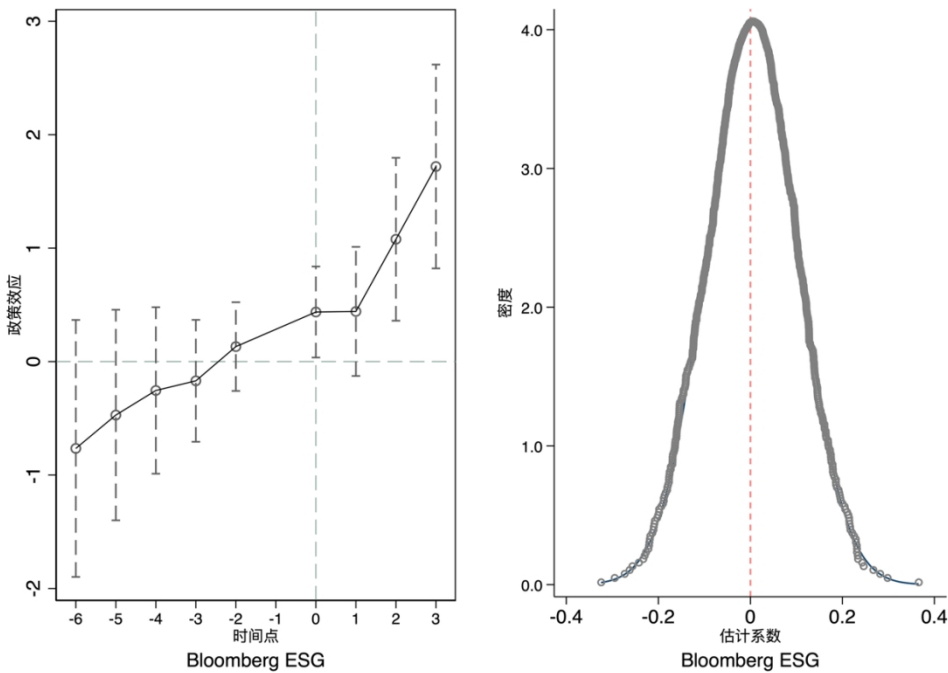


图 1 平行趋势检验与安慰剂检验

表 3 报告了稳健性检验结果。列（1）至列（3）将被解释变量由 Bloomberg ESG 评分替换为华证 ESG 评分（Huazheng ESG），以检验结论是否依赖于特定 ESG 评价体系。结果显示，公共数据开放（PublicDataOpen）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即使采用更贴近中国资本市场情境的华证 ESG 评分作为替代性因变量，公共数据开放对企业 ESG 表现的促进作用仍然成立。

进一步地，列（4）采用熵平衡法进行稳健性检验。鉴于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建设并非完全随机，处理组与控制组可能在企业特征和城市特征方面存在系统性差异，本文通过逐年熵平衡法对样本进行加权，使两组样本在主要协变量分布上更加均衡。结果显示，公共数据开放的估计系数仍显著为正。列（5）进一步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进行检验，基于企业层面和城市层面变量估计公共数据开放的倾向得分，并通过逐年核匹配方法为处理组样本构造加权对照组。结果同样显示，公共数据开放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本文结论并非由样本选择偏误所驱动。

无论是替换被解释变量，还是采用熵平衡法与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改善处理组和控制组的可比性，公共数据开放变量的估计系数均保持正向且显著。上述结果表明，公共数据开放促进企业 ESG 表现改善的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表 3 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

	替换变量检验			熵平衡	倾向得分匹配
	(1)	(2)	(3)	(4)	(5)
	Huazheng ESG			Bloomberg ESG	
PublicDataOpen	0.498**	0.460*	0.428*	0.654**	0.498*
	(0.243)	(0.235)	(0.235)	(0.317)	(0.301)
企业控制变量	No	Yes	Yes	Yes	Yes
城市控制变量	No	No	Yes	Yes	Yes
企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75.118***	42.453***	50.028***	8.998	11.408
	(0.125)	(6.671)	(12.853)	(18.860)	(15.795)
<i>N</i>	8029	7843	7843	7842	7709
R-squared	0.572	0.592	0.592	0.856	0.855

注：*、**、***分别表示估计结果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企业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

由于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并非在所有城市同步上线，而是随时间在不同地级市分批推进，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可能受到处理时点错位和处理效应异质性的影响，进而导致估计偏误。为此，本文采用 CSDID 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通过识别不同处理批次在不同时点的组别—时间平均处理效应，并进一步汇总为总体平均处理效应，能够更好地适应分批实施政策下的异质性处理效应问题。表 4 报告了基于 CSDID 方法的异质性稳健双重差分估计结果。

从列（1）至列（3）的 ATT 估计结果来看，公共数据开放的平均处理效应均显著为正。未加入控制变量时，ATT 系数为 1.305，并在 1% 水平上显著；加入企业层面控制变量后，系数为 1.041，仍在 1% 水平上显著；进一步加入企业与城市层面变量后，系数为 1.280，同样在 5% 水平上显著。说明在控制处理效应异质性后，公共数据开放仍能显著提升企业 ESG 表现。

列（4）至列（6）进一步报告了政策实施前后的平均效应。结果显示，Pre_avg 系数均不显著，表明政策实施前处理组与对照组不存在显著系统性差异，也未发现明显政策预期效应，进一步支持平行趋势假设。相较之下，Post_avg 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公共数据开放实施后企业 ESG 表现明显改善，且在加入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后该结论依然成立。CSDID 估计结果进一步验证了本文基准结论的稳健性。公共数据开放对企业 ESG 表现的促进作用并非由潜在的处理效应异质性偏误所驱动，而是在异质性稳健估计框架下依然成立，从而增强了研究结论的因果解释可信度。

表 4 异质性稳健双重差分法的回归结果

	(1)	(2)	(3)	(4)	(5)	(6)
	Bloomberg ESG					
ATT	1.305*** (0.374)	1.041*** (0.396)	1.280** (0.535)			
Pre_avg				0.138 (0.126)	0.118 (0.384)	-0.136 (0.378)
Post_avg				2.206*** (0.598)	1.777*** (0.671)	2.314** (1.035)
企业控制变量	No	Yes	Yes	No	Yes	Yes
城市控制变量	No	No	Yes	No	No	Yes
企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5430	5263	5263	5430	5263	5263

注：*、**、***分别表示估计结果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企业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本表基于 CSDID 方法对公共数据开放的处理效应进行估计。第（1）—（3）列为所有处理组在所有时期上的总体平均处理效应（ATT）估计结果；第（4）—（6）列进一步考察分时期动态处理效应，报告了政策实施前平均效应（Pre_avg）与政策实施后平均效应（Post_avg）的估计结果，通过计算政策实施前后的平均处理效应，本文能够进一步检验公共数据开放的政策效应是否存在实施前趋势。样本量减少是由于该方法仅保留处理时间明确、处理前观测充分且具有有效对照组的样本，关键变量缺失或无法构造有效组别—时期比较的观测值被自动剔除。

（三）边界条件分析

表 5 报告了公共数据开放影响企业 ESG 表现的边界条件分析结果。本文分别引入分析师关注度（AnalystAttention）、报刊财经正面新闻数（PositiveNews）、绿色补贴占营业收入比重（GreenSubsidy）和内部控制指数评分（InternalControl）作为调节变量，并考察其与公共数据开放的交互项。各列均控制企业财务特征、公司治理特征、地区层面变量，并加入企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从回归结果看，公共数据开放与调节变量的交互项在四组模型中均为正，且分别通过不同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具体而言，列（1）中，公共数据开放与分析师关注度的交互项系数为 0.045，并在 5% 水平上显著，说明分析师关注度越高，公共数据开放对企业 ESG 表现的促进作用越强。分析师作为资本市场中的重要信息中介，能够通过研究报告、盈利预测和公司跟踪提升企业信息透明度。当公共数据开放改善外部信息环境后，分析师能够更充分地利用公共数据资源识别企业 ESG 行为，从而强化公共数据开放的治理效应。

列（2）中，公共数据开放与报刊财经正面新闻数的交互项系数为 0.005，并在 5% 水平上显著，表明正向声誉约束能够增强公共数据开放对企业 ESG 表现的促进作用。正面财经新闻报道提高了企业声誉可见度，也使企业更重视外部公众评价。在公共数据开放背景下，媒体报道与政府数据开放共同改善信息传播环境，使企业 ESG 行为更容易被市场和社会识别，企业为了维持既有声誉优势并避免声誉受损，因而更有动力持续改善 ESG 表现。

列（3）中，公共数据开放与绿色补贴占营业收入比重的交互项系数为 3.864，并在 10%水平上显著，说明绿色补贴强度越高，公共数据开放对企业 ESG 表现的促进作用越明显。绿色补贴为企业开展环境治理、节能减排和绿色转型提供资源支持，有助于缓解 ESG 投入的资金约束；公共数据开放则改善外部信息环境，强化企业行为的可见性和可评价性。二者共同作用下，企业既拥有改善 ESG 表现的资源基础，也面临更强的外部监督压力，因此公共数据开放的 ESG 改善效应更加明显。

列（4）中，公共数据开放与内部控制指数评分的交互项系数为 0.003，并在 5% 水平上显著，说明内部控制质量越高，公共数据开放对企业 ESG 表现的促进作用越强。内部控制较好的企业通常具有更完善的风险管理、信息披露和治理执行机制，能够更有效地回应外部制度环境变化。当地方政府推进公共数据开放时，这类企业更容易将外部信息透明压力转化为内部治理改进和 ESG 行动，从而表现出更强的 ESG 提升效果。

表 5 公共数据开放对企业 ESG 表现的调节效应回归结果

Moderating Variable (MV)	(1) AnalystAttention (2) PositiveNews (3) GreenSubsidy (4) InternalControl			
	Bloomberg ESG			
PublicDataOpen	-0.255	0.165	0.464	-1.534

	(0.407)	(0.326)	(0.303)	(1.075)
MV	0.006	-0.003	-3.001**	0.0003
	(0.015)	(0.002)	(1.482)	(0.001)
PublicDataOpen × MV	0.045**	0.005**	3.864*	0.003**
	(0.017)	(0.002)	(2.081)	(0.002)
企业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城市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企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21.876	6.572	10.891	16.229
	(19.130)	(16.363)	(15.672)	(15.654)
N	5974	7250	7842	7655
R-squared	0.864	0.857	0.859	0.860

注：*、**、***分别表示估计结果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企业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

进一步地，为更直观地揭示公共数据开放影响企业 ESG 表现的边界条件，本文绘制了条件边际效应图（如图 2 所示）。该图展示了调节变量在其样本最小值至最大值的实际观测区间内变化时，公共数据开放对企业 ESG 评分的预期影响。结果显示，公共数据开放对企业 ESG 表现的促进作用并非无条件发生，而是受到外部信息监督、正向声誉约束、政策激励以及企业内部治理能力的共同塑造。

具体而言，随着分析师关注度提高，公共数据开放的边际效应逐渐增强，说明资本市场信息中介能够通过加工、解释和传播开放数据，提升数据透明度的可识别性和可评价性，从而强化外部监督压力。随着报刊财经正面新闻数增加，公共数据开放对企业 ESG 表现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这表明，媒体正向报道能够提高企业的声誉可见度，并通过强化正向声誉约束促使企业更积极回应市场与社会期待，从而持续改善 ESG 表现。绿色补贴占营业收入比重越高，公共数据开放的治理效应越强，说明信息透明压力与政策激励之间存在互补关系。内部控制指数的结果表明，企业内部治理能力是公共数据开放发挥作用的重要组织条件；内部控制质量越高，企业越能将外部透明压力转化为 ESG 改进行动。值得注意的是，当四个调节变量处于较低水平时，公共数据开放对企业 ESG 表现的边际影响均不显著。这表明，公共数据开放的治理效应并非自动发生，而是需要外部信息监督、正向声誉约束、政策激励支持和内部治理能力等条件达到一定基础，具有明显的条件依赖性。

总体来看，图 2 进一步印证了表 5 的交互项结果。公共数据开放对企业 ESG 表现的治理效应具有明显条件性，其作用并非由“公共数据开放”直接传导至“企业 ESG 改善”，而是依赖于信息监督、正向声誉约束、政策激励以及企业内部治理能力等多重条件。换言之，公共数据开放是一种外部信息治理工具，

其治理效能取决于开放数据能否在信息监督中被有效识别，在正向声誉约束中被持续传播，在政策激励下获得资源支撑，并最终被企业内部治理体系吸收和转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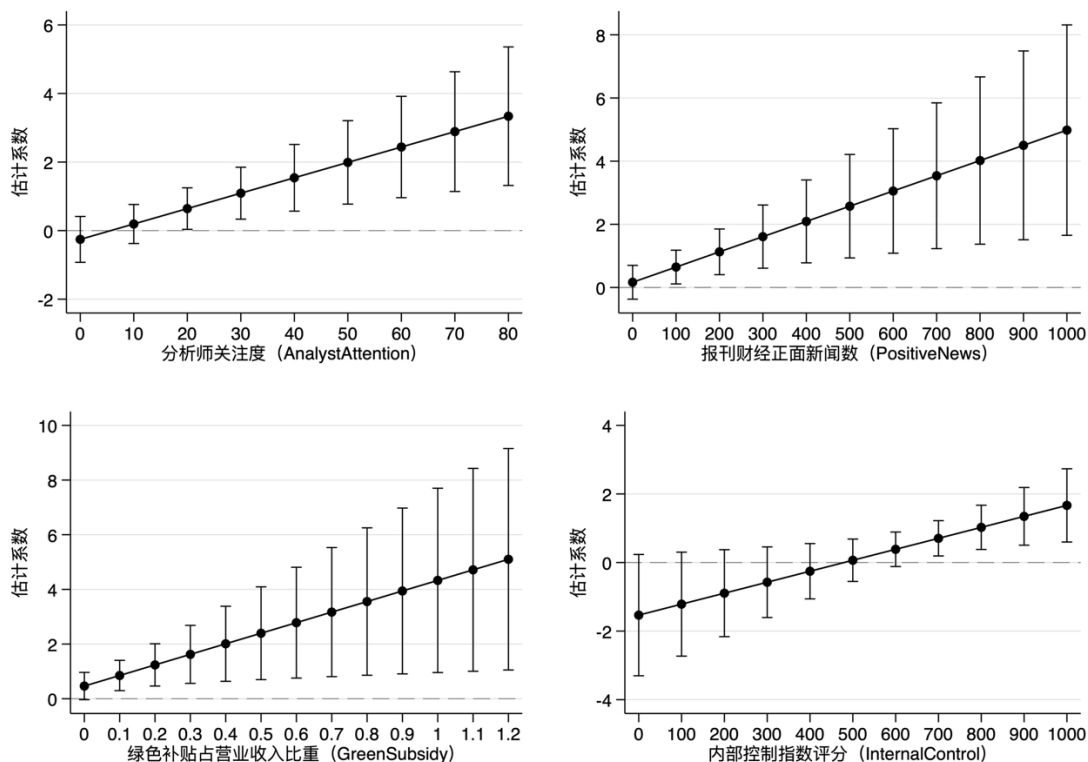


图2 公共数据开放对企业 ESG 表现的边际效应图

注：点为边际效应估计值，竖线为 95%置信区间。图中估计系数越高，说明公共数据开放对企业 ESG 表现的促进作用越强；置信区间是否跨越 0，则反映该条件边际效应是否具有统计显著性。

五、讨论与结论

本文围绕政府公共数据开放能否促进企业 ESG 表现改善这一问题，以地级市公共数据开放平台的分批建设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公共数据开放显著提升了企业 ESG 表现。该结论在替换为华证 ESG 评分、采用熵平衡法、倾向得分核匹配、安慰剂检验以及 CSDID 等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平行趋势检验表明，政策实施前处理组与对照组企业不存在显著差异化趋势；政策实施后，公共数据开放对企业 ESG 表现的促进作用逐步增强，说明其治理效应具有一定的动态累积特征。

进一步地，地方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对企业 ESG 表现的影响具有明显的边界条件。调节效应结果显示，信息监督、声誉约束、政策激励和内部治理能力均会强化公共数据开放的治理效应。具体而言，分析师

关注度越高，公共数据开放越容易通过资本市场的信息识别与评价机制转化为外部监督压力；报刊财经正面新闻数越多，企业的正向声誉可见度越高，公共数据开放所释放的信息透明压力也越容易通过媒体传播转化为声誉约束；绿色补贴占营业收入比重越高，公共数据开放所释放的透明压力越容易与政策激励相结合，进而推动企业 ESG 改进行动；内部控制质量越高，企业越具备吸收外部信息压力并将其嵌入内部治理流程的能力。边际效应图进一步表明，随着信息监督、声誉约束、政策激励和内部治理能力的增强，公共数据开放对企业 ESG 表现的促进作用逐渐提升，说明其治理效应并非无条件产生，而是具有明显的边界条件。

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将地方政府公共数据开放纳入企业 ESG 表现的解释框架，揭示了政府侧数字治理改革对企业可持续治理的制度性外溢效应。第二，从企业行为结果出发拓展了地方政府公共数据开放的治理价值，说明公共数据开放不仅能够提升政府透明度和公共服务能力，也可能通过改善外部信息环境影响市场主体行为。第三，识别了地方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发挥治理效应的边界条件。本文将研究重点从“公共数据开放是否有效”推进到“何以有效、何时更有效”，从信息监督、正向声誉约束、政策激励和企业内部治理能力四个维度揭示其作用机制与适用条件。

在实践层面，地方政府应推动公共数据开放从一般性平台建设转向面向企业可持续治理的信息供给。公共数据开放的价值不仅在于“是否开放”，更在于能否为市场主体、媒体和第三方机构识别企业 ESG 行为提供有效信息。因此，应加强生态环境、市场监管、企业信用、行政处罚、财政补贴和公共资源交易等数据的有序开放与关联使用，提高企业 ESG 行为的外部可见性，为信息监督与声誉约束发挥作用提供基础条件。同时，应推动公共数据开放与政策激励和企业内部治理能力相结合。一方面，地方政府可将绿色补贴、环境治理支持等政策激励与企业 ESG 表现、环境信用和治理改进情况相衔接，增强政策激励的引导作用。另一方面，企业应将 ESG 嵌入内部控制、风险管理和战略决策过程，提升 ESG 数据管理、合规管理和风险响应能力，将外部监督压力转化为实质性治理改进行动。

本文仍存在一定局限。第一，公共数据开放的测量仍有细化空间。本文主要依据地级市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建设情况识别公共数据开放状态，能够反映地方政府是否进入公共数据开放阶段，但难以充分刻画数据开放质量、更新频率、可用性、部门覆盖范围和实际使用活跃度等差异。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构建公共数据开放质量指数，区分“形式性开放”与“实质性开放”的不同治理效应。第二，本文虽检验了信息监督与声誉约束、政策激励以及内部治理能力等边界条件，但对开放数据如何被市场主体、媒体、第三方机构和企业内部治理系统具体使用，仍缺乏过程性证据。未来研究可结合平台访问数据、下载记录、媒体文本、分析师报告和企业 ESG 实践文本，进一步揭示其微观传导机制。

本文研究结论表明，地方政府公共数据开放能够显著促进企业 ESG 表现改善。公共数据开放通过改善外部信息环境、提升企业行为可见性和强化外部监督，为企业可持续治理提供了重要制度支撑。其治理效应在信息监督与声誉约束更强、政策激励更充分以及企业内部治理能力更高的条件下更加显著。由此可见，公共数据开放不仅是数字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推动企业 ESG 治理和地方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公共治理工具。

【参考文献】

- [1]柴尚蕾, 曹梦君, 冯慧, 魏伟, 吴逸凡. 企业 ESG 信息披露、媒体关注与财务绩效——基于地区数字化水平与行业环境敏感度的异质性分析[J]. 西安理工大学学报, 2024, 40(3): 301-314.
- [2]Nie S, Wang S, Ji Q. Break down data silos: Does public data openness improve corporate ESG performance?[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ial Analysis, 2025, 106: 104480.
- [3]Gonzalez-Zapata F, Heeks R. The multiple meanings of open government data: Understanding different stakeholders and their perspectives[J]. 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 2015, 32(4): 441-452.
- [4]Attard J, Orlandi F, Scerri S, et al. A systematic review of open government data initiatives[J]. 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 2015, 32(4): 399-418.
- [5]Lin O, Guan J. The impact of media attention, board independence on CEO power, and ESG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J]. Finance Research Letters, 2024, 62: 105180.
- [6]Ming Y, Li Y, Liu N, Li J. Retail investor attention and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hina[J]. Finance Research Letters, 2023, 56: 104143.
- [7]樊燕萍, 赵玉薇. 董事会断裂带、ESG 表现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内外双重路径的检验[J]. 中国流通经济, 2026, 40(3): 68-82.
- [8]Ruijter, E., Détienné, F., Baker, M., Groff, J., & Meijer, A. J. (2020). The politics of open government data: Understanding organizational responses to pressure for more transparency. The American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50(3), 260–274.
- [9]Walker K, Wan F. The harm of symbolic actions and green-washing: Corporate actions and communications on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nd their financial implications[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12, 109(2): 227-242.
- [10]陈晓珊, 刘洪铎. 内部控制质量与公司 ESG 表现[J]. 统计与决策, 2025, 41(9): 169-173.
- [11]Kráľ P, Schnackenberg A. Organizational responses to transparency determinants[J]. Management Decision, 2024, 62(13): 309-331.
- [12]王锡铨, 王融. 公共数据概念的扩张及其检讨[J].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23, 26(4): 17-27.
- [13]王丛虎, 王聪. 公共数据开放何以影响亲清政商关系——来自城市数据开放平台上线的准自然实验[J]. 探索, 2026, (1): 42-54.
- [14]Bauhr M, Carlitz R. When does transparency improve public services? Street-level discretion, information, and targeting[J].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21, 99(3): 500-516.
- [15]Meijer A. Understanding the complex dynamics of transparency[J].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013, 73(3): 429-439.
- [16]Hu Z, Sun P. Does open government data improve public service quality?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based on the launch of open government data platforms in China[J]. Public Performance & Management Review, 2026, 49(2): 510–536.
- [17]Irvin R A, Stansbury J.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decision making: Is it worth the effort?[J].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004, 64(1): 55-65.
- [18]陶云清, 侯婉玥, 刘兆达, 阳镇. 公众环境关注如何提升企业 ESG 表现?——基于外部压力与内部关注的双重视角[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24, 45(7): 88-109.
- [19]Liu Y, Zhang J, Dai Y. Analyst following and greenwashing decision[J]. Finance Research Letters, 2023, 58: 104510.
- [20]Elamer A A, Boulhaga M. ESG controversies and corporate performance: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governance mechanisms and ESG practices[J].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24, 31(4): 3312-3327.

- [21]Jia J, Li Z. Does external uncertainty matter in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performance?[J].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2020, 65: 101743.
- [22]Ye F, Han X, Li X. Constraints under the Halo: The Constraining Effect of Corporate Reputation o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Behavior. *Sustainability*. 2024; 16(19):8405.
- [23]Xu R, Xu C. How Government Open Data Platforms Affect Corporate ESG Performance[J]. *Sustainability*, 2025, 17(21): 9768.
- [24]陈晓珊, 陈思敏, 刘洪铎. “双碳”目标下政府环境治理补助会提升公司 ESG 表现吗[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3(5):132–144.
- [25]屈文彬, 宋海燕. 政府补助对企业 ESG 表现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 A 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资源开发与市场*, 2024, 40(12): 1855-1863.
- [26]Huang J, Han F, Li Y. Government as major customer: The effects of government procurement on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performance[J]. *Finance Research Letters*, 2023, 54: 103781.
- [27]Qiang G, Ruan J. Can government public data openness help enterprises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mpirical evidence based on corporate ESG greenwashing[J]. *Finance Research Letters*, 2025, 86: 108875.
- [28]Wang R, Ren L. Cross-border ESG regulations and corporate compliance: the role of policy compliance willingness in shaping ESG performance[J]. *Journal of Asian Public Policy*, 2025, 1–18.
- [29]关静怡, 朱恒, 刘娥平. 股吧评论、分析师跟踪与股价崩溃风险——关于模糊信息的信息含量分析[J]. *证券市场导报*, 2020(3): 58-68.
- [30]刘璇, 姚维玲. ESG 信息披露、政府补助与企业绿色创新绩效——基于制造业 A 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 *财务与金融*, 2025, 40(4): 75-84.
- [31]叶康涛, 曹丰, 王化成.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能够降低股价崩盘风险吗?[J]. *金融研究*, 2015, (2): 192-206.